

《满江红》是由张艺谋执导，沈腾、易烊千玺等主演的春节档电影。以悬疑、喜剧等元素为外壳，将家国情怀与商业类型片元素进行了融合，整部影片“很张艺谋”。

《满江红》悬疑与喜剧杂糅的特点非常明显，这是张艺谋在商业方面的考虑，他执导过喜剧悬疑类的《三枪拍案惊奇》，也执导过谍战类的《悬崖之上》，还执导过身份成谜的《影》，三部影片的手法糅合起来，形成了《满江红》喜剧与悬疑杂糅的风格。

首先说喜剧。看到沈腾与岳云鹏这样的演员阵容，你就知道张艺谋这次搞喜剧是认真的，起码在表现形式上喜剧的元素不会少。从沈腾叫易烊千玺三舅，影片的喜剧效果就出来了。岳云鹏稍显克制的贱兮兮的副总管形象，也输出了不少喜剧段子。可以说，在影片前三分之二的篇幅里，喜剧的段子比较密集。

再说悬疑。“金国使者死在宰相驻地，所携密信也不翼而飞。”这样的剧情设置，就是明显的探案剧开头，接着这样的设置，抽丝剥茧，嫌疑人一个个排除，嫌疑人一个个死去，线索不断向前延伸，《满江红》符合大多数悬疑题材作品的故事逻辑，只不过，加上古装，放置在一个“南宋绍兴年间，岳飞死后四年，秦桧率兵与金国会谈”的背景下，为影片表述更为宽广的情怀埋下了伏笔。

《满江红》也是张艺谋将喜剧与悲剧的反差灵活运用的作品。喜剧元素是外壳，内核依然是悲天悯人的悲剧，喜剧与悲剧的反差形成的悲喜交加，在影片中比较明显。

古希腊先哲亚里斯多德认为，喜剧模仿的是比一般人较差的人物，所谓“较差”，并非指一般意义上的“坏”，而是指丑的一种形式，即可笑性，可笑的东西是一种对旁人无伤，不致引起痛感的丑陋。亚里斯多德最早关于悲剧的定义是：“悲剧可以唤起人们悲悯和畏惧之情，并使这类情感得以净化，获得无害的快感。”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满江红》中，沈腾饰演的张大就是一个“较差”的小人物，从而在影片前三分之二的篇幅里达到喜剧的效果。金国使者死在宰相驻地，小兵张大成为“背锅”者之一，他们被要求抽签领死，张大极尽搞笑能事，胆小怕事的他还是阴错阳差地卷进是非。在随后的探案过程中，他表面上不断地被别人侮辱，展示着“不致引起痛感的丑陋”。

类似的起到喜剧人物作用的还有岳云鹏饰演的武大人，这个角色类似赵本山在《三枪拍案惊奇》中饰演的角色。当然，《满江红》在喜剧元素运用、悬疑故事链条构建、影片主旨等诸方面，都是《三枪拍案惊奇》无法比拟的，岳云鹏饰演的武大人，相比赵本山在《三枪拍案惊奇》中的角色，有更为丰富立体的综合表现，体现出角色“较差”带来的可笑性或滑稽感。比如，武大人的腰刀接连三次被不同的人拔走，这个人物在喜剧概念上的“较差”就体现得淋漓尽致。

喜剧只是《满江红》的外壳之一，当张大将刀捅向刘喜，悬疑氛围增强的同时，悲剧本色自此开始。随着联合刺杀秦桧的动机暴露，一个个同伴被杀掉，张大背上的“精忠报国”貌似也要被刮掉时，悲剧氛围越来越浓厚。观众的悲悯与畏惧之情渐渐升腾，悲悯的是一群小人物的悲惨，畏惧的是他们可能会更惨。随着最后秦桧背诵岳飞的《满江红》，全军将士复诵，观众“情感得以净化，获得无害的快感”，完整的悲剧故事终于达成。

《满江红》有着历史情绪与文学情境叠加的影子。虽然有“南宋绍兴年间，岳飞死后四年，秦桧率兵与金国会谈”的背景设置，但《满江红》显然不是一部历史片，“南宋、岳飞、秦桧”这些要素外化为一种真实的历史情绪，这种历史情绪与电影的文学情境融合，通过“全军复诵”岳飞《满江红》这样仪式感十足的内容，以期待实现与观众的共情。

《满江红》的历史情绪，要素是片中人物要完成的“任务”，即岳飞是忠臣，岳飞为奸臣所害，通过秦桧之口传颂岳飞《满江红》的形式，实现对英雄的致敬。这种历史情绪，之前已经通过不同的艺术形式，包括老百姓的口口相传，形成了“共识”。

将历史情绪文学情境化，仪式感是必不可少的。在《满江红》中，孙均要秦桧（实际是替身）背诵《满江红》，并下令“全军复诵”，引出了影片最后阶段的大场景，从一个人，到传令兵，到部分士兵，到全体禁军，一起背诵“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这样的场面很燃，也很容易让观众共情。通过电影的大场面让观众共情，张艺谋是擅长的。这样的方式虽说有些“直给”，但结合剧情，情到深处，还是管用。

**作者简介:**倪自放，资深媒体人，山东省签约文艺评论家。



## 《满江红》：张艺谋的杂糅与仪式感

◎ 倪自放

## 张朋画兔形神墨动

◎ 宋寒儿



张朋画兔。

兔年画兔，兔年赏兔，古今有关“兔”主题的作品，画兔者常常将小兔与月亮、月宫和嫦娥等意象相结合，恰与言兔咏兔者一道，勾勒出具有奇幻想象力的诗意图。不论绘画，还是诗歌，置身于想象空间中的小兔往往带给观者一种浪漫和神秘的感觉。

作为著名大写意花鸟画家，张朋先生笔下的小兔则会带给观者一种更亲切、更“家常”的印象。这种印象的形成，多半是因为张朋先生对小兔主题画面的构思与经营。首先，张朋先生笔下小兔出现的场景不再是神秘的未知之地，而是农家庄园、田野乡间，小兔们也不再与神仙人物或月桂作伴，而是与高大的农作物相伴。比如张朋先生画过两幅小兔与玉米在一起的场景，有趣的是，其中一幅以《玉兔》命名的作品，展示了农家风光与现实世界的可爱之处。在这两幅作品中，小兔们好像都藏在玉米下驻足张望，虽不知小兔们在张望什么，但是其眼神与姿态带给画面一份紧张与期待，而玉米秆直穗长，为小兔们提供了很好的遮挡空间，既突出了视觉的中心，又延展了画面的高度，玉米叶中依稀可见的饱满玉米粒，也象征着丰收季节的来临，与毛绒圆滚的小兔搭配在一起，既显示出田园的丰盈生机，也显示出自然的和乐美意。张朋先生的兔画，让观者不再停留于传说的想象空间，而是在现实生活的广阔大地中发现美的栖息，在稀松平常的平淡生活中感受生命的魅力。

在张朋先生另一幅代表性作品《狡兔茄子》中，陪伴小兔出现的则变成圆形的茄子。张朋先生对几何图形的搭配格外得心应手，小兔圆润的脑袋、身体和尾巴，与深色的茄子形成一个小小的呼应。画面中这只转头观望的小兔，不禁让人想到北宋画家崔白的名作《双喜图》中的抬头小兔。崔白不仅捕捉到兔子在瞬间表现出的动态，同时又刻画了两只喜鹊，工写兼备，动静结合，呈现出动物间耐人寻味的关系。而在张朋先生的《狡兔茄子》中，兔子则是画面的绝对主角。张朋先生捕捉到了小兔在特定情形下转头竖耳的这一瞬间，不知是被什么所吸引的它机警地竖起了耳朵。画面中即使只有小兔，但观者仍可以通过小兔竖起的耳朵和眼睛凝视的方向，感受到画面之外的环境带给小兔的影响。张朋先生用几何图形营造的空间感和用物象变化制造的时间感相结合，将“不闻其物，但见其声”化于纸张之上，令整幅画面妙趣横生。

近现代大家中也有很多善画兔者，但这一部分作品在公众视野中出现的机会较少，研究者通常也会将更多注意力集中在更有代表性体貌特征、更具有象征精神意义的动物题材上。但对于小兔的描绘，往往可以看出画家在捕捉灵动眼神、描绘绒毛细节等方面功力如何，因此也可以被视为研究该画家的一个切入点。

比如张朋先生与白石老人之间的师承渊源，白石老人也画过不少兔子，他笔下的兔子造型别致，追求夸张，尤其是被无限拉长的兔子耳朵、上挑且形状尖锐的兔眼，以及非常具有存在感的四肢，都给观者留下深刻的印象。相较之下，张朋先生的兔子既添了一分毛茸茸的质感，又添了一分圆滚滚的憨态。张朋先生有一张小品《兔》，充分利用水汽氤氲来打造兔子的绒毛感，毛色的笔触都很浅淡，唯圆溜溜的眼睛用黑墨强调，瞳孔处又一点高光，能感觉到小兔用怯怯的、柔柔的目光打量着外部世界，真真是我见犹怜。

又比如张朋先生对刘继卣先生的学习，张朋先生与刘继卣先生一样注重写生。两位先生力求画中形象的准确性，都经常去动物园写生，仔细观察动物的形态。正因为对写生的重视，刘继卣先生笔下的小兔才如此生动逼真，尤其是兔眼部分细腻传神，有一种楚楚动人的味道。刘继卣先生是连环画创作大师，特别注重动物元素对画面的烘托作用，反过来动物也会主导画面的氛围营造。他画中的小兔清新脱俗，线条流畅，配合一旁新鲜可口的荔枝点缀，营造出了柔美、优雅的画面氛围。张朋先生基于对万物生灵细致的观照，他的兔子也是造型精准，活灵活现。但同时，张朋先生的小兔更有意趣和意味，因此画面总有一种天然的稚拙和“呆萌”，有一种对生命由衷的赞美和欣喜。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玉兔是祥瑞和福气的象征，今年春节，大家也爱用“兔”的谐音来表达美好的祝愿，如大展宏“兔”、前“兔”似锦、扬眉“兔”气、“兔”飞猛进，成绩“兔”出，谈“兔”不凡等等。品鉴张朋先生的兔画，观者似乎也会收到一种祝福和期盼：珍惜平凡生活中每一个微小而美好的瞬间，享受生命中每一份“小确幸”的快乐。

**作者简介:**宋寒儿，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文艺评论》征稿邮箱:  
zaobaofukan@126.com  
请在标题中注明“《文艺评论》  
投稿”。(2000字+短视频评论)



文化  
青岛